

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生产的人”与技术

——兼论海德格尔与莫兰对马克思的误诊

杨兴凤,赵梓成

(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南宁 530004)

摘要:“生产的人”是马克思考察人的本质的一个基础性形象。处在资本主义体系当中的“生产的人”进行着异化的生产,因此,以“生产的人”为分析起点,有助于更完整地理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批判。技术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外化产物,标识着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它在一定社会结构中规定着人的生产样式,所以技术既是“生产的人”的本质的塑造因素,又在资本逻辑下构成了对“生产的人”的统治力量,这种双向运动成为马克思论述技术与“生产的人”的核心。海德格尔与埃德加·莫兰对于马克思的“生产的人”与技术的关系的论述,是理解马克思思想内核两种不同思路的参照;海德格尔在生存论的视野上将马克思的“生产的人”误诊为“仍未超出主观主义的形而上学”,因而使其未能达及马克思所能达到的真正历史性维度;莫兰则认为马克思“生产的人”这一人本学的第一根基,需要“心理的人”这个人本学的第二根基来补充,因而莫兰走入了弗洛伊德式的“抽象”。

关键词:“生产的人”;技术;马克思;海德格尔;莫兰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21)12-0019-08

在马克思考察人的本质的理论体系中,“生产的人”是一个基础性形象。而技术随其发展不断渗透到人的本质力量的构成要素中,且在资本的强力驱动下成为统治人的力量,使“生产的人”进行着异化生产。马克思将生产作为历史之本质基础的视野使其吸收并超越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并使他在历史性的生产活动中看到了生命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生产,从而也就具有了比海德格尔式生存论的存在论境域更为厚实的历史基础。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在“生产的人”与技术中间加入了一个“心理的人”,意图“补齐”马克思对“生产的人”的论述,这反映出莫兰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具有不彻底性,且反映出莫兰在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中陷入了弗洛伊德式的想象。从“生产的人”与技术出发,将马克思、海德格尔、

莫兰三位思想者的论述放置在一起进行对照,有助于更清晰地理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真旨。

一、马克思:“生产的人”与技术

(一)生产实践从根本上规定了人的本质属性
在马克思那里,实践是理解人的本质属性的决定性环节,而生产是人类实践的主要表现形态。从最初有意识地改变自然的现成形态从而获得生命需要的物质资料开始,人的活动就首先表现为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生命活动——物质资料的生产,“一旦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1]147}。人的这种有意识的活动就是马克思称为实践的活动,它确证了人作为类存在物对世界的主动介入,也勾勒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结构。脱离实践是无法理解人的生成及其本质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

作者简介:杨兴凤,1981年生,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赵梓成,1996年生,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作是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做类存在物。”^{[1]56-57}在这个意义上,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的实践活动被马克思提升至与人的存在统一的高度。

而生产劳动作为最初的实践形式表现着人的本质。“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便构成基础。”^{[2]1002}生产劳动构成人的存在最初的、也是最根本的表现形态,但人的生产实践不仅仅是简单的物质资料的获取过程,而是“现实的人”的整个生命的表现方式。这个“现实的人”是与他的全部实践生活相同一的。通过考察人类社会的演进规律,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逻辑揭示人的生产活动与人类历史的关系:“以一定方式进行生产和活动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1]151}也就是说,生产是人类最初的、也是最根本的历史性活动,物质生产活动构成人类历史的起点。人的生产活动产生的实践方式与实践产品生成了超越个体实践者生命周期的人类活动史,这种超越性凝结在生产方式与产品中,以文明成果的方式构成新的生产实践主体的历史基础。马克思据此建立起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为基础的实践史,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内核。在马克思看来,人作为历史性的存在是奠基在生产实践活动基础上并表现在生产活动中的。生产创造了人类历史,也创造了人本身。但马克思所指的人类的生产,绝不仅仅是这种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因为这仅仅是维持生命存活简单生产,真正对人的规定性具有本质意义的是扩大再生产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精神生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言明:“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1]159}这种历史活动在语言和意识缔造的社会交往关系中规定着人之为人的本质属性——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

总之,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下,人从根本上说是作为“生产的人”而存在的,生产是人的

实践活动的根本方式,也是人确证自身存在的最主要方式。有着敏锐观察力的德国学者洛维特论断说,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接受了费尔巴哈的立场,把人的本质解释为社会性的存在和生产^{[3]274}。

(二)“生产的人”的异化与技术的关系

理解马克思“生产的人”的规定性及其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异化状态,绕不开“技术”这个机要。谈到技术,法国技术哲学家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简洁地直入核心,“外在化就是通常所说的技术(technics)”^{[4]10},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提出外在化的第一代思想家”^{[4]19}。外在化即内在意识的外在化。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表述过这种内在意识的外在化:“说话的口,劳动的手,还有走路的腿,如果我们愿意添加上去的话,都是实现内在和完成内在的器官,所以它们本身就包含着行动自身或内在自身;内在通过这些器官而获得外在性,成为外在行为,而行为却是一种从个体分离出来的现实。语言和劳动都是外在的东西,在这种外在的东西里,个体不再保持它的内在于其自身,而毋宁是让内在完全走出自身以外,使之委身于外物。”^[5]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外在化在第一需要物质资料的获取中固定为工具,在实践活动中凝成技术。这种外化表明马克思的思想与行动紧密相联。所以,从根本上说,马克思唯物主义之本质隐蔽于技术的本质中^[6]。

技术虽作为外化的产物,从起源上说根植于人的内在意识与外在行动的辩证运动,但技术一旦产生并结合一定的生产结构,就规定着人的生产样式,而且技术变革总能激活新的社会关系。所以,马克思以宏观的历史唯物主义视野表述道:“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1]222}

当在生产体系中的人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组织到这种生产结构中时,“生产的人”之生产活动呈现异化状态:“劳动者不是在由他所付出的劳动中获得自己的存在,而是与商品一起以物化的形式生产出他自身。”^{[3]274}由此,形成的资本主义世界的事实是,对物的世界之利用的生产正比例

地生产着人的世界的贬值,也就是说生产的人的整个生命活动被颠倒为生产的手段:“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的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善,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1]52-53}而这种异化状态,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机器中实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对此进行了分析论述:在资本的逐利本性驱动下,提高劳动生产力和最大限度否定必要劳动时间,是资本的必然趋势^{[7]775}。而在这一趋势之下,资本总过程中的劳动资料转化为最终形态——机器(或更确切地说,自动机器体系),而工人自己只是被当做自动机器体系的有意识的肢体^{[7]773}。

工人的活劳动创造的价值被表现为机器的运转,成为“自为存在”的价值。“科学通过机器的构造驱使那些没有生命的机器肢体有目的地作为自动机来运转,这些科学并不存在于工人的意识中,而是作为异己的力量,作为机器本身的力量,通过机器对工人发生作用。”^{[7]774}在这样的生产过程中,劳动就仅仅表现为是有意识的机器零件,分布在机器体系上的有生命的工人个体在这个强大的机体面前无足轻重。在机器体系中,资本把创造价值的活劳动占为已有的价值,而在这种价值表现中,单个劳动力创造价值的力量作为无限小的量趋于消失^{[7]775}。这是资本发展的要求,资本天然地要求知识和技能的积累化为机器体系中运转的技术,使整个生产过程中的价值创造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属性,它以物的形式同工人相对立。“在机器的体系中,对工人来说,知识表现为外在的异己的东西,而活劳动则从属于独立发生作用的对象化劳动。只要工人的活动不是[资本的]需要所要求的,工人便成了多余的了。”^{[7]776}

资本主义体系中“生产的人”根本无法阻挡科学技术介入生产过程形成更强大的机器生产体系,并使活劳动从属于这个机器体系。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是资本觅利的必然趋势。“资本的趋势是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而直接劳动则被贬低为只是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7]777}于是,技术的力量(以机器体系为其物质的形式)在资本主

义生产体系中就成为一种包含着自己反面的神奇东西:它“减少了人类劳动的强度并且使劳动更有成效,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疲劳……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3]154}。这可以看作是马克思对技术的负面价值(工人沦为机器的附庸)的批判。

我们看到,“生产的人”和技术的关系在马克思那里呈现一种双向运动:“生产的人”离不开技术对于其生产活动的必然参与,同时,技术在“人的生产”中是通过“生产的人”的活动来完成其参与人的本质塑造的。在这个双向运动中,技术既被视为社会发展的有机成分,又因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而产生了对人的“控制的极权主义”——劳动异化现象,使技术社会成为“没有反对派的社会”^[8]。据此,分析“生产的人”与技术的关系就成为马克思揭示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必然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此因素之下,技术问题与人的解放直接关联在一起。于是,在马克思那里,去除加诸在技术这种实践上的异化机制是使人回归到人的本质的必经之路,这同时构成马克思在社会实践基础上将技术与伦理价值融通起来的思想。

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指向人类社会的进步与人的解放。他的劳动异化理论、机器工业理论都渗透着对技术的道德评价,并同时探索通过生产结构与社会制度的变革来去除技术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下对人施加的统治。马克思的这种探索使他首先要考察技术发展的社会制度根源,这也是《资本论》用了整整一章来分析机器与大工业与资本觅利的关系史的原因。通过考察技术发展的社会根源,论证了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是使技术回归到人以组织生产确证自身即“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道路,即技术活动真正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人的力量的对象化。“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存在,是人的本质力量打开了的书本,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9]据此,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拒绝了从理性形而上学、先验的人权、自由等方面来论述人的本质,而是从人的技术性社会生产活动(即“生产的人”)的角度来论证人的本质——技术与“生产的人”的关系是人的本质得以实现的关键。而

在“生产的人”的技术性存在状态中,人对物的驾驭方式(技术)深刻地影响着人的自由程度,因此,在马克思那里,人最终获得自由的根本性动力必须先从工业、技术当中获取。

二、海德格尔:“生产的人”与对技术的追问

(一)海德格尔对马克思的“生产的人”的误诊

对海德格尔来说,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探析奠基在一种优越于任何其他历史观的历史观之上:“因为马克思在经验异化之际深入到历史的一个本质性维度中,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就比其他历史学优越……故无论是现象学还是实存主义,都没有达到有可能与马克思主义进行创造性对话的那个维度。”^{[10]403}但海德格尔认为,唯物主义的本质就隐藏在技术的本质中,唯物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形而上学规定。他指出,按照这种规定,一切存在者都表现为劳动的材料,而马克思继承来自黑格尔对现代劳动的本质的形而上学规定——“无条件地制造(Herstellung)的自行设置起来的过程,这就是被经验为主体性的人对现实事物的对象化的过程”^{[10]404},从而就合逻辑地将技术放置于展开唯物主义哲学的关节处,将人的本质探求奠基于劳动和技术的形而上学运思上。简言之,马克思在海德格尔那里仍然是处于形而上学形态的思想家。虽然不可置疑的是,马克思一直处于海德格尔哲学运思的背景中,但海德格尔对马克思的思想尤其是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还呈现出“形而上学式的误诊”。

首先,他认为马克思关于人的理论实质上源于形而上学,特别是黑格尔的存在概念。“马克思以他的方式颠倒了黑格尔的观念论,这样他就要求给予存在先于意识的优先地位。”^[11]海德格尔承认马克思像尼采一样对形而上学做了真正倒转^{[12]379},但他也认为在马克思那里,人的存在表现为“生产过程”,“这个想法是马克思从形而上学那里,从黑格尔把生命理解为过程那里接受来的。生产之实践性概念只能立足在一种源于形而上学的存在概念上”^[11]。海德格尔甚至从马克思的“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1]10}的论断中,得出马克思实质

上将人的优先性置于存在的优先性之上,因此断言马克思对人的界定仍未超出主观主义形而上学。海德格尔对马克思的人的学说的理解,迫使我们澄清马克思思想关键概念的真正内蕴:马克思的“生产过程”与“实践”当然是具有某种意识前见的人的生产过程和实践,但这个“生产过程”和“实践”是作为人所参与的物质性活动过程而存在的,它们具有超越于概念性理解的意蕴,是既具有意识活动也走出意识活动之外的现实活动。

其次,马克思在《关于费巴哈的提纲》中将人的本质归结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在海德格尔看来,是人的“可订造性”(Bestellbarkeit)的另一种说法,在被置于“生产”和“消费”当中的现时代,“每一个人(他自身就是他自己的根本),正是这种生产以及隶属于生产的消费的人”^[11]。这也成为海德格尔批判马克思仍陷在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的证明,因为这个人不是他本身,而是在现代性和资本主义主导的生产过程中的“生产的人”和“消费的人”,所以海德格尔认为这恰恰违背了马克思自己所论断的“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但是,需要澄清的是,扬弃异化是马克思的思想核心,马克思所设想的作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所需要的生产过程,是摆脱生产强制的、摆脱拜物教现象的人的根本需要。也就是说,这个“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论断内含着对现存状态的未解,既是对“历史之谜的解答”,也是马克思寻求人类解放之路上的精神诊断书:未来之人仍然是“生产的人”,但彼时“生产的人”是对现时“生产的人”的超越与解放,生产已成为确证自身存在、回归人的存在的本质需要的活动。换言之,马克思设想的人在自由状态下的生产过程,是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与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的统一,是摆脱了海德格尔所论的技术之“座架”强制作用的自由劳动^[13]。^①而且到了人

^① “座架”是海德格尔对统治世界诸多强制的共同之处的指称,此处所引文章原文使用的是“支架”,但结合海德格尔的相关文献,笔者认为“座架”更为合适。下文对“座架”有更为详尽的阐述。

全面发展的阶段,“生产”的概念也将摆脱异化状态回复到其全面状态,是创造、产生(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 hervorbringen),而不是处在“被订造”的状态中的人的活动。海德格尔对马克思的理解缺少马克思本人所具有的历史意识和超越意识内在性的特质。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解放的学说确实奠基于生产过程的基础之上,因为他需要通过考察人的物质性的历史生产条件,从而寻找人的自由的前提。这种历史性考察必然将物的自然性要素纳入到其视野中,从而使马克思关于人的学说转换成人的实践活动史(生产关系史),以历史唯物主义学说超越关于人之意识内在性思想,从而使马克思找到实现人的自由的路径——变革生产体系的社会制度,达到“人的生产”与“生产的人”的真正契合。

(二)海德格尔论技术与人的存在

基于上述对马克思的“生产的人”的误读,海德格尔质疑作为“生产的人”的存在安排。海德格尔曾断言,“人的自身生产带来了自身毁灭的危险”^[11]。他认为,统治着当今世界的是“进步强制”,这一“进步强制”又引起了一种“生产强制”。海德格尔用“座架”(das Ge-stell)一词称呼诸强制的共同之处。座架是集中(Versammlung),是所有安排(Stellen)方式的共同性,这些安排方式将人塞入尺度之中,当前人就是在这个尺度中生一存(ek-sistiert)的^[11]。“我们用‘座架’来表述现代技术的本质。”^{[14]23}海德格尔在讨论班中分析了这个“座架”的内涵:它首先含有“迫使”之意,也就是“自然界被迫供应其能量”^[11]。一旦自然界被安排供应能量,同时人也就被安排去对付与回应这种被生产的能量……甚至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可以说:对自然界的迫使越严重,人自身遭受的迫使也就越严重^[11]。据此,我们可以得出海德格尔的“座架”以及诸强制直指技术(Gestell 是用来命名现代技术之本质的词^{[14]23}),以及其所带来的对人的生存安排。

海德格尔叫做技术“座架”的东西,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可以看作是资本最大化的社会性组织和技术手段的汇聚,从根本上说,它是资本逻辑的

具体化和技术化^[13]。在海德格尔那里,现代技术是一种“强夺”(ravishmeng),它意味着“暴露”(exposing)和“开发”(exploiting),其本质是“促逼”^{[14]14}和“侵入”(rape)^{[14]78}。现代技术的这种根本特征使它对人类命运构成危险,“对人类的威胁不只来自于可能有致命作用的技术机械与设备装置。真正的已经在人类本质处触动了人类”^{[14]28}。海德格尔认为,要回归到真正的技术本质即“技术乃是一种解蔽方式”^{[14]12},才能使技术与人的关系从根本上得到澄清。在这一点上,现代技术具有的危险性使人被安置、被命令且使存在的天命蔽而不见,海德格尔认为救赎之道在于用“沉思之思”来充分洞察技术的本质,从而使救渡显露出来。

(三)人在技术之途上的救赎之道

海德格尔回到古希腊追问技术的本质,从而“构筑一条道路”来实现对现代技术造成的危害(技术之本质……乃是危险^{[14]28})的解读,即实现对存在的救赎。海德格尔认为,技术在古希腊那里表明的是某种创作(etwas Poietisches),它与知识交织在一起,表述的是对某物的精通与理解,因此它是启发,追求的是解蔽,“技术是一种解蔽方式”^{[14]13}。海德格尔将解蔽的获得界定在真理的领域当中,“技术的本质在真理的本有中现身”^{[14]35}。而这种“真理的本有”就是我们对于技术的“思之虔诚”的追问。也就是说,海德格尔寄希望于思维方式的转换来走出技术异化的现实。在这一转换中,他强调“思”对于动作的先在条件性,“手的每一个动作都植根于思”^{[15]1218}。海德格尔的这种“思”不是“计算性思维”,而是“沉思之思”。后者并不是一般人所认为的飘摇于现实之上、没有根基的思,恰恰相反,体现着现代力量的科学技术本身是“无思”的(比如原子弹所标识的核科学,海德格尔就认为其“不思”)。“沉思之思要求我们,深入那自身内初看起来好像完全不集中的东西之中”^{[15]1238},据此可以另有作为:“我们可以利用技术对象,却在所有切合实际的利用的同时,保留自身独立于技术对象的位置,我们时刻可以摆脱它们。……我们可以对技术对象的必要利用说‘是’;我们同时也可以说‘不’,因为我

们拒斥其对我们的独断的要求,以及对我们的生命本质的压迫、扰乱和荒芜。”^{[15]1239}海德格尔将这种对技术世界既说“是”也说“不”的态度界定为:“对于物的泰然任之(die Gelassenheit zu den Dingen)”,以及达到“对于神秘的虚怀敞开(die Offenheit für das Geheimnis)”^{[15]1240}。

虽然海德格尔也深思过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并且他也理解了马克思在“社会”中发现合人性的人这一点^{[12]364},但他并没有真正深入到马克思的“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当中。因此,海德格尔在对人与技术关系的分析中,既未能真正理解马克思的“生产的人”的本意,也未能理解马克思的“人自身的生产”的理论内容,最终,海德格尔也就不能真正做到将马克思的“生产的人”及共产主义学说当作是“一种对世界历史性地存在着的東西的基本经验”^{[10]404}。故而,海德格尔在技术异化的救赎之道上,仍然陷在“思”中,这种对技术的态度从本质上讲带着一种退行性意图。海德格尔晚期常用的语汇如“牧养”(Hirten)、“耕作”(Äckern)、“田间路”和“林中路”等,都带着一种与现代发展背向而行的乡村牧歌式期望。而马克思的思想核心则是通过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制度乃至人的实现方式的根本变革,超越资本逻辑对技术的支配、对人的支配,避免人类自身生产带来自身毁灭的危险,实现人的自我解放,达至“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1]10}。

三、莫兰:“生产的人”“心理的人”与技术

(一)“生产的人”需要“心理的人”的补齐

与海德格尔不同,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的人本政治学构想意图以“心理的人”来补充马克思的“生产的人”。莫兰认为,最先提出人本政治观念的是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它曾经在它的基础(总体的人)、它的核心(国际的革命的政洽)、它的目的(无产阶级的社会、全面发展的人)中是人本学的”^{[16]118}。但莫兰也认为,马克思过早地停止了卓越的人类学探索,这导致他围绕着生产这个核心揭示剥削本质及提出消灭剥削的方案,并没有全面说明人类不平等现象的根源:“在马克思的人的概念中,一切都是围绕着生产的核

心连接起来的。”^{[16]12}因此,“生产的人”在莫兰看来几乎是马克思视域中社会人(总体的人)的代名词。莫兰认为马克思“并不追求说明爱情的经验,也不追求说明梦想的经验”^{[16]13},故而,“马克思的总体的人缺少第二个核心——心理的核心,而这个核心将会与制造工具的人这个核心相联”^{[16]13}。在莫兰看来,弗洛伊德的“心理的人”可作为补充。据此,马克思—弗洛伊德的配合将同时炸毁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精神分析学^{[16]19}。莫兰的思路也是弗洛姆的思路,弗洛姆认为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分别为“人的科学”作出重要贡献,如果把马克思的人性观与弗洛伊德的人性观综合起来,就能建立更加完善的人性理论。弗洛姆的以下观点与莫兰如出一辙:人类需要关联到他人并且关联到他自己的情感生命。通过发展他们的自我意识和想象力,人们在应对现实时的本能部分同时会缩减。遗传的本能和驱动力被精神的需求替换,而这种精神需求对现在来说是为了生存下去而需要实现的。这导致依据自然的、社会的和文化环境的、以及内在对于全面发展和成长的要求而形成人的特征^[17]。

莫兰的“心理的人”的提出,表明他要求马克思主义的“生产的人”这个外向的因素需受到“心理的人”这个内在因素的检视,即人类感情力量这个内在因素在人类的生存与实践占据同样重要的地位。莫兰以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来说明这一点。莫兰认为,现代民族主义就产生于国际主义的失败(即人类整体上解放人类的运动的失败),且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间内,民族国家还会是世界舞台的主角。民族本征的需要实质上是支配人类深层意识的恋父—恋母情结的转移,这凝聚着人类最原始、最幼稚、最强劲的感情力量。而马克思主义将关注点放在了跨跃民族因素的“生产的人”这个点上,低估了民族存在这个因素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重要意义,这构成20世纪政治上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缺陷。因此,莫兰断言,“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狭隘的人类学”,这种狭隘性体现在“马克思只在狭隘的现实中活动”^{[16]14-15}。

实质上,莫兰对马克思的“生产的人”所在的

“现实”概念有误解。马克思是以“实践—社会的方式”来规定现实^{[3]150},而在“实践—社会的”现实中,马克思并没有否定“感性”,他反对的是那种旁观者式的感性直观,因为这种直观实质上是把人的本质作了另一种形式的抽象。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现实的人是人的实践活动尤其是生产劳动的产物,包括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都是人的实践历史的产物,“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1]151}。这些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们在现实的历史场域中构成自己的现实,并“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所制约”。也就是说,“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1]152}。据此,莫兰所诘问的马克思的“生产的人”是“一个狭隘的人类学”“只是在狭隘的现实中活动”,实质上恰恰表明莫兰还停留在马克思所批判的费尔巴哈式的“感性”中,莫兰没有体味到海德格尔所觉知到的马克思深入到历史本质中的那一维度,也没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从社会实践活动史考察到人性的形成根源理论之深刻性。马克思把人的本质解释为在社会中存在和生产^{[3]274},这里的“生产”应理解为人的本质性的、始源性的历史行动,包含着四个方面的生产:一是物质资料的生产,二是人的生产,三是精神生产,四是社会关系的生产^[18],这种全面生产构筑起马克思的“生产的人”的形象。故而,莫兰用“心理的人”——那个梦想着、恋爱着的人来“补齐”马克思“生产的人”实属附赘。

(二) 技术文明与“生产的人”的阶级性

莫兰认为,技术已经抹去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社会模式的对立。他认为,技术的发展使文明的统一性显示出来,因此,在技术文明这个“伟大的、普遍的逻各斯”之下,将世界简单划分为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对立模式已不具有真正的有效性,因为工业的统一性比模式的对立性更具有决定意义。这种统一性从根本上源于技术——这个文明的酵素与基座。但莫兰也意识到,“世界的破碎性”即技术推动的同一个发展在经济方面虽然推动着世界的统一,但在另一方面又引起世界分裂为许多民族存在^{[16]77}。并且莫

兰认为,社会主义从人类整体上解放人类努力的失败就是忽视了民族主义的结果。莫兰据此以“技术的统一化与民族主义的多元化”的复杂性视角来审视马克思解放学说中“生产的人”的阶级性:技术这个“普遍的、伟大的逻各斯”孕育着世界的统一性(资本主义文明与社会主义文明相互渗透形成“一种社会——资产阶级的文明”^{[16]77}),民族的存在使世界的统一性成为“破碎的”——民族实体的不可抵抗并在今后成为普遍存在的力量,赋予了世界现代发展的框架和它的主角——民族国家。

在莫兰的分析中,以上因素使马克思的解放学说的根基即“阶级”概念变得双重不可能: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技术所带来的同一经济活动中的对立性正在消失,民族国家具有的深厚根基所决定的民族实体的不可抵抗性又消解着阶级解放理论所具有的超国家的国际主义本质。莫兰据此对马克思基于“生产的人”的阶级属性进行质疑。这导致莫兰最终以一种“新的发展模式”来取代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非此即彼选择,新的发展模式是柔性和多元主义的模式^{[16]108}。

莫兰虽然将“伟大”之名赋予技术所带来的“世界性”,但他对技术也持有复杂性态度,这表现在他对于技术带给人的存在前景的忧虑上,“技术带来文明的同时也带来新的野蛮状态——以操纵事物为乐”^{[16]146}。“我们的世界通过其科学技术的发展变得在道德上、理智上、情感上欠发展。”^{[16]147}这致使人的存在处在各种危机的咬合中。因此,莫兰提示人重新武装其理智,对科学技术发展之盲目性与在其引领下的进步幻想保持警惕。莫兰以“共同的必死意识”这种悲观主义的存在观唤起每个人对每个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相互同情和团结互助,以实现第三个千年的人类使命。这成为莫兰式的解放观与马克思的解放观的鲜明对比,但毋庸置疑的是,莫兰靠期望、神话和梦想来维系的“伟大规划”与马克思唯物史观基础上的人类社会演进分析相比,陷入了弗洛伊德式的抽象。

结 语

尽管海德格尔与莫兰这两位哲学家都对马克

思的“生产的人”与技术的分析进行了再解释,意图引向一种对相关问题解释的马克思之外的视角,但是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莫兰在他的复杂性伦理学系统中,将人类的未来构架于“连接”上,强调道德意识与理智意识,从而抛弃了以阶级性与革命去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正确路径,选择了一条在理念中寻找概念性之简单化解决方案以寻找人类未来的道路。而按照“向着存在而思”的思维路径,海德格尔指责马克思“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的论断“达到了虚无主义的极致”^[11]。海德格尔认为,马克思把存在规定为人自身的生产过程且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将“生产的人”的形象推向极致,存在被遗忘且彻底不见了。海德格尔的诘问实质上忽视了马克思在“解释世界”后“改变世界”的努力是超越了传统形而上学的虚无主义的,“生产的人”是通过生产活动走出自身的人,也是将物质性因素通过生产过程纳入到存在之中的人。在马克思那里,要扬弃技术异化而带来的对人的全面统治,只有经过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技术与物质累积才能达到,因此,扬弃的过程并不是退回到“思”其本质,而是要以理论的彻底性唤起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自觉行动,并且利用技术与物质的累积进行武器批判,以实现人的自我解放与真正本质的回归。

技术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进步以及带来的人类历史的进步,是不可还原与逆行的进程,并不是退回到心理——精神因素就可以在概念中“得到解决”的。因技术在现代世界中引起一些消极后效就激起对技术的拒斥和敌视,这并不是一种合乎历史理性的思维向度。技术深度塑造着人的整体存在方式,而人也在使用技术过程中不断丰富着人的本质元素,这是一个生成过程。一种对待技术的退行性视域和走向内心的内在运思并不能将人类的存在带进田园牧歌与健康生活,只会成为阻碍现代人类发展的浪漫遐想。如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一样充分去发现、批判与建造一种合理的存在秩序,将技术安置在一种合理的人的存在结构中与人一起持存,也许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式的思维向度。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02页。
- [3] Karl Löwith, *From Hegel to Nietzsche: the Revolu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translated by David E. Gree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4.
- [4] 贝尔纳·斯蒂格勒:《南京课程:在人类纪时代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自然辩证法〉》,张福公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 [5]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32页。
- [6] 科斯塔斯·阿克塞洛斯:《未来思想导论:关于马克思和海德格尔》,杨栋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4页。
-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 [8] 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6-7页。
- [9]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4-85页。
- [10] 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 [11] F.费迪耶等辑录:《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丁耘摘译,《哲学译丛》2001年第3期。
- [12] 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上),孙周兴选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
- [13] 孙利天、史清竹:《我们如何走出人的自身生产带来的自身毁灭的危险》,《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第2期。
- [14] Martin Heidegger,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translated by William Lovitt,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77.
- [15] 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孙周兴选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
- [16] 埃德加·莫兰:《人本政治导言》,陈一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 [17] Eric Fromm, *Beyond the Chains of Illusion: My Encounter with Marx and Freud*, Continuum, 2009, p.viii.
- [18] 俞吾金:《被遮蔽的马克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93-394页。

[责任编辑:朱磊]